

望乡

——康巴作家尹向东小说论

■魏春春

尹向东的家庭叙事除过上述四平八稳的叙述之外,还有关于婚外恋的描述。如《愿言》中洛绒与静萍约会跑马山,享受婚外恋爱的激情与紧张。而《像阳光一样透明》则是婚外情被发现后出现的一系列耐人寻味的故事。吴默发现了张大年与刘敏的婚外恋情,由此拉开了三个家庭的混乱局面,直到最后当所有人把矛头指向发现人吴默时,他发现所有人都在遮掩真相,都在说谎,甚至产生了“许多事情就是这样说不清,也不需要说清”的认识,这种观念彻底击碎了吴默的生活信念,于是,他站在楼上“鸟一样张开双臂跳了下去”。这两部作品中,结局都有一个男人跳了下去,《愿言》中的洛绒为证明对静萍的感情而奋身跳崖,《像阳光一样透明》中的吴默无法忍受谎言而跳楼。尹向东在作品中关注的不是婚外恋情,而是人们对婚外恋的态度以及恋情被揭穿后人们的表现,身处恋情中的已婚男女既不会抛弃家庭而结合,也不愿意放弃彼此之间的爱恋,他们紧张地小心翼翼的维护自己精心编织的谎言,一旦谎言被揭穿,就将几个家庭内部的平衡彻底打破,就引发出的一系列的人生世相。

此外,在尹向东的康定书写中,还试图编织康定的历史,展现历史风云变幻中康定不灭的魂灵,显著者是《唱情歌的人》。开篇“那时候康定满城还是木质结构的板房,两层楼,沿折多河两侧排列开来。满城的街道也都由青石板铺就,关外来的藏人,赶着马,的的嘚嘚行走其上,混合穿长衫的陕西商人,以及戴白帽的回人,共同为这小小的城市添加繁华”,将叙述的镜头拉向康定的过往,而将过去与现在连接在一起的康定情歌。在不同的时期,康定情歌承载着不同的社会功能,或者说人们赋予康定情歌别样的价值,而歌唱者或歌手则直接与康定情歌不同时期的社会功能连接在一起。走亲访友唱情歌是欢娱的象征,而对外来的贵宾唱情歌是展现康定特色的荣誉,当“奇吉村被短暂地更名为战斗生产队,随之名称的变化,尼玛不能唱歌,唱这些情歌意味着堕落和小资”,最终尼玛被剥夺了歌唱的权利,也失去了生活的乐趣,只能黯然死去,而随着尼玛一并逝去的还有那古老质朴的康定情歌。

在尹向东的康定书写,锅庄书写明显带有成长记忆的痕迹。《坎上》追忆的是三十多年前的往事,是对少年生活的记叙,《丢手巾》记叙的则是父辈之间的故事,这两篇作品着力凸显康定锅庄生活的多样性和融合性。关于锅庄,在这两部作品中有着相同的描写:康定锅庄是旧日茶马古道上的茶马商人的媒介,又是各路商人脚穿毡靴的店子,以一色的木质板房构成,两层楼,像不规则的四合院。院子内铺满大青石板,藏区汉子牵马赶牛,带雪域的药材、珠宝来康定,住进熟识的锅庄。汉地商人雇背夫,把成捆的茶负在身上,一步一个脚印翻越二郎山来康定,也住熟识的锅庄。他们在锅庄完成交易,锅庄充当中间人,也当翻译。多年前的康定城,就由大大小小的锅庄院坝组成。不过这都是进入史书的事情,解放后,修路建房,大部分锅庄变为钢筋混凝土的楼房,剩余的一些也分配给平民作了居所。后来的锅庄更像一个大杂院,居住着不同民族、不同职业的人们。

罗家锅庄在一个坎上,两进院子,大院坝进去,里面还有一小院,也都铺了青石板。锅庄里住十多户,大部分是藏族。十来户人家,又有许多靠赶马为生,康定人习惯把他们称为驮脚娃,挂靠在群众运输站。许多区乡还没有通公路,他们把日常用品驮到偏远的区乡,再把粮食驮回来。锅庄的历史功能既是旅店,又是交易场地,承担着茶马贸易的重要职能,康定城由锅庄汇聚而成,康定城就是最大的锅庄。锅庄容纳着不同民族的人群,因而,民族间日常生活的交融就非常的频繁。尹向东将目光锁定在罗家锅庄,铺叙发生在这里的故事。在锅庄里,藏族是主体,而藏族男性们多为驮脚娃,不断地行走在城乡之间;汉族和其他民族是少数,他们由于各种原因,暂时栖居在锅庄,于是,孩子之间、大人之间的日常交往就不得不产生交集。而在尹向东的书写中,藏族驮脚娃无论是大人还是孩子,都是孔武有力、热情、豪爽和善,无一例外的是汉族家庭中男女老少都是相对谦卑文雅瘦弱,而在相互之间的交往中,饮酒是重要的交际方式。而汉族的父子或兄弟们都并不擅长饮酒,为了彼此之间的交往更为和谐,他们都无一例外地学会了饮酒,于是,尹向东在作品中有许多是关于饮酒环节的描写。其中有一个细节就是倒酒或倒茶,汉人都习惯反着手倒,“按藏族的规矩,反手是给故去的人倒,一正一反,亦是一阴一阳两个世界”,于是在藏族家庭中的聚会,汉人的此种行为往往受到藏族主人的呵斥,让汉人们有一种屈辱感,心生不快,为此,当他们想要获取主动权,满足个人的心理平衡时,就以反手倒酒的动作惩戒对方,这就产生了彼此之间的摩擦以及相互之间的融合等情节。锅庄成了民族融合、民族对话的场域,具备了特殊的文化交融、情感共鸣的社会空间的意义。甚至在某种意义上,康定亦具备如此的文化空间价值。

回顾尹向东的创作历程,或会发现他早期的写作中,奔翁贡玛与康定是分离的,如同两条平行线一般构成他的写作路径,这可能是由于这一时期尹向东的写作还处于自发状态,侧重情感的自然流露,还可以看出尹向东这一时期,较为注重现实之境的写作,试图张拓民族原生态生活的理想图景。但是封闭式的写作方式显然不适应文学发展的实际,尹向东试图回到康定的历史文化书写,却发现单纯的藏族或藏族与其他民族之间的对话太过单一,难以打破民族原生的藩篱,难以有新的突破,为此,当他在作品中希冀打通奔翁贡玛与康定之间的联系,而在更为宏大的视野中关注生活在这一片土地上的人们时,他的写作进入到新的阶段,既有传统的望乡情怀的诗意表达,也有展望栖居地的现实呈现,两相交融,势必创作出康巴文学的新的篇章。

H:当然,对于这些,我们不应苛求,而是应抱有更大的希望。因为溪流已经由雪山上流淌下来,溪水会成为江河;牛犊羊羔已经呱呱落地,会在广袤的草原上呼啦啦地成长。

育林人。其加达瓦 绘画作品



康巴的小说与血性温情

近年来,康巴地区出现了达真、格绒追美、泽仁达娃、尹向东、蒋秀英、桑丹、赵敏等作家。他们以康巴藏地为背景,通过一个个富有人情人性的人物和故事,描绘出民族波澜壮阔的历史和广阔丰富的宗教文化。他们在创作中表现出哪些一致性的特征?这些特征与他们的民族宗教、文化有何联系?所有这些问题都值得我们去深入探讨。本文试图通过自我对话的形式(L和H的设置只是出于形式的需要),更为生动地展现“康巴小说”的风貌。

■刘火

『康巴』作为一个概念

L:不经意间,由于出生于1970年后的一批康巴汉子的努力,四川小说的版图逐渐开始改变——在四川,成都、达州地区及南充地区的小小说三足鼎立,而现在正在形成新的重镇,而且初步展现出与以往小说不大不同的新气象。

H:我也注意到了四川小说的这一变化。不仅因为年初甘孜州政府与《文艺报》在北京专门为达真长篇小说《命定》举行的座谈会,而且,我还注意到了武汉的《芳草》2012年第5期头条推出泽仁达娃的长篇小说《雪山的话语》。显然,无论前者还是后者,对于最近稍显沉寂的四川小说来说,都是一件可

以拿来一说的事件。L:由此,在四川文学界,有人提出一个“康巴小说”或者“康巴作家群”的概念。在我看来,与其他文学体裁相比,小说是最接近生活图景和自然图景的。因此,小说的发生和成长,与人为的“概念”没有直接的关联。或者说,小说从本质上讲,是排斥概念的。尽管近现代小说的发展,无不与概念、理论相关。但是,小说就其本身的规定看,也许是不需要概念的。因此,当一种新的小说气象展现在我们面前时,我们不能被原来轻车熟路的一些概念或理论所困囿。所以,我们

H:确实如此,单是康巴藏地的自然图景,就呈现给读者不一样的新鲜与陌生(在我看来,“新鲜与陌生”恰恰是文学所追求的)。我们可以看一些例子。例如达真的《命定》中写到:“被黑暗连在一起的天空和草原渐渐分出两大色块,带亮的色块作为黎明的代言人拉开了白色的天幕,它告诉草原,一天之中辞旧迎新的时刻来到了。那一

对神秘自然的描写

战争书写与血性情怀

L:是的。在康巴小说里有一个重要的元素是对战争(包括战争、仇杀等)的书写。达真《命定》写康巴人参加了在云南的抗日战争。泽仁达娃的《雪山的话语》写了因为牧场、草原、领地引发的不同部落的战争。格绒追美的《隐蔽的脸》则涉及了一些仇杀场景。

H:当接触到康巴小说关于战争的书写时,我便想:不是这一群生在康巴藏地的汉子们喜欢战争,或者说,由于在这块地方曾经有过大大小小的战争而迫使这群作家不得不去面对。再进一步说,在这块人迹罕至的雪山草地上,战

争是这有着极强生命力的康巴人不得不做出的选择。L:也许因为牧场、草原、领地引发的不同部落的战争和因为爱情或别的原因如嫉妒引发的仇杀可能是这样的。但是像《命定》里书写的战争却是因为日本侵略者的侵犯。在《命定》里,战争写得不仅大气磅礴,而且非常华美。具体来说,它书写的是有康巴人参与的收复腾冲、攻克松山的战斗。这是一场让中华民族摆脱困境、去掉自卑的战役。达真试图在作品中重现、反思那场战争,从中我们看到了作者的艺术追求:一是表现康巴人的血性,二是

神灵与宗教

L:关于康巴小说,除了战争描写,“神灵的力量”与“宗教的感召”也是非常重要的一方面。藏族佛教在康巴藏地有上千年的传统,在以藏语为母语的康巴地区,其思维、文化等,无疑会受到宗教的影响。在《雪山的话语》里,有这样一首巫曲,它唱道:“神灵聚集的西藏是我真正的故乡/巴鲁扎嘎大神山来到康巴地区一千又五百年”。

H:正是因为这样的观念,“神灵”与“宗教”在康巴小说里随处可

见。格绒追美的《隐蔽的脸》,无论是人物情节,还是山川自然,都与神灵相关。在小说中,神灵不仅充斥在小说的始终而且弥漫在小说的每一个角落。小说中的人物,时而以“人”的姿态出现,时而以“巫”的姿态出现,使小说具有一种扑朔迷离之美。

L:《隐蔽的脸》一书有一个副标题,即“藏地神子秘踪”。这两个标题可以看做是藏地康巴神与人关系的暗喻。在达真的《命定》里,有一个不经意的“托梦”情节:“在土尔吉来到

『多声部』叙述

L:我觉得,在我所读的康巴小说里,往往交织着至少两条主线:一条是关于现实人物和事件的叙事,另一条是关于神灵的书写。这两条主线按照各自逻辑发展,同时又彼此关照、彼此映射,有时候会在某一节点上重叠。每一条线索都有自己的逻辑和声音。这样的书写策略和叙事模式跟巴赫金所说的“复调小说”有些类似。

H:的确有这样一种倾向,我们可以通过一些例子来说明。在《雪山的话语》里,一条是头人与土司们的争斗史,一条是阿绒嘎与纳吉的情爱史,还有一条是作者思考的生命轮回的艰辛史。前两条在显处,后一条在隐处。三条线基本上是平行展开,各有各的逻辑,各有各的价值指向,连叙事的语言也不一样。

L:显然,这样的叙事拓展了小说的审美空间。在《命定》中,也存在“多声部”的叙述。土尔吉,一个虔诚的佛教徒,因青春的萌动、爱情的召唤触犯了寺规,被逐出寺庙,

遭到心上人贡觉措家族的追杀。贡布,一个强悍剽悍的康巴汉子,因为仇家的追杀,而被迫逃亡。在逃亡中,土尔吉感受到了贡布的热诚、友爱和见识,也变得勇敢了起来。在上一千里的逃亡路途上,共产党人的救亡热情激发了两个逃亡汉子内心的一次心灵碰撞,可以说是“质的突变”。特别是当土尔吉目睹了远征军一位师长的豪侠气概时,那种对英雄的向往,那种一往无前的豪气,被彻底地激活了!或者换个角度讲,血性的张扬,以及由血性变种的情爱史,在人性与神性的共同召唤中,得到了皈依。几个“声部”同时进行,同时发声发力,让整个康巴地区和康巴汉子们在嘈杂喧嚣中散发着勃勃生机——从草原到山地、从寺庙的清规戒律到平凡藏人的烟火人间,从读经到赛马、从藏地的歌谣到俗话,从高僧大德的情诗到民间的淫词小调、从牛羊的交媾到人的男欢女爱……

还是不要一开始就把一种新的文学现象用什么概念把它圈养起来,而应把它当作一个开放的系统给予关注。就像达真、格绒追美、泽仁达娃等描述的那些牛羊一样,让它们自在康巴草原上自由地游荡。H:我赞成这样的态度和意见。不过,既然要谈论一个新的气象或话题,分析它所呈现出来的异质,就得从理论上作出一些必要的分析和概括。譬如,这一批产生于康巴地区的小说在价值取向、描述方式、语言特点上有没有共同点……

L:这是当然的。如果真有“康巴小说”或“康巴作家群”这么一

有像这样的自然图景的描摹,甚至可以说,原生的自然图景在小说中几乎快绝迹了,因为人们的生活已经远离了大自然。在康巴小说里,由于生于藏地康巴的作家们的努力,这种久违了的自然图景得以重现。这就是一种“新鲜与陌生”。倘若,我们读到的小说其景其情其思都似曾相识的话,那么,这样的小说显然很难说是好小说。反之,则就不同。现

构建关于战争的“宏大叙事”。

H:无论是在哪一方面,《命定》都给四川当代小说提供了新的经验。关于康巴人血性的书写,可以从《格萨尔王》那里找到源头,在阿来的《尘埃落定》中也有所展示,《命定》将这种传统继承了下来,用浓墨重彩的笔墨加以书写。四川文学中,战争题材的并不是特别多,但近来的这些康巴小说无疑弥补了这一方面的缺憾。血性书写和战争描写,有时候是合二为一的,尹向东在《鱼的声音》中写到:“峡谷中,果然遭遇狼群,有朦胧月光映照下,四面都是发

这个世界的上一天,妻子在阵痛中偷偷地告诉他,前天晚上她梦见了文殊菩萨,菩萨笑容满面地说,土尔吉是一个学经的好喇嘛,送他去绒布寺吧。”这个看似不经意的细节,其实就是康巴藏地“神与人”、“宗教与世俗”的互动。神灵在昭示,神灵在扶佑,神灵在康巴的历史深处又在康巴的当下世俗生活之中。

因此,在这些小说里,我们看到了一种“宗教的感召”。尽管上千年的佛教没能完全阻止仇杀,但

H:就连一篇容量不大的短篇小说《蝴蝶的舞蹈》(注西彭措笔),也突破了篇幅有限的藩篱,大胆植入“多声部”的书写策略。这是一篇歌颂爱情、表达对纯真爱情的追求的小说,却在其中加进了男主人公顿珠是转世活佛的设置。顿珠好不容易赢得格桑的爱时,却突然间被寻访了25年的老僧人认定:刚满25岁的顿珠正是两位老僧人跋山涉水历经艰辛要寻访的登巴扎西活佛的转世灵童。而活佛是不能婚配的。对于信众来讲,找到并确认转世灵童,无疑是一件天大的喜事,但对于顿珠和格桑则是晴天霹雳、五雷轰顶。在这类轮回的故事中,因为爱情的自由与宗教戒律之间的严重冲突,经常要女子不惜牺牲自己的生命来成全一个轮回的转世活佛。于是,一桩男女爱情的悲剧再一次在顿珠和格桑身上上演。不同的是,顿珠终于在纠结之中选择了世俗。格桑母亲却重蹈上一轮回的悲剧以自杀断

说,那么“康巴”作为一个地域概念应该引起注意。

H:康巴作为中国藏区的一部分,有着不同于西藏、青海,甚至不同于同在四川境内的阿坝地区的文化。在新时期,整个藏区产生了不少在全国都有影响的作家作品。有生于斯长于斯的藏族作家扎西达娃、阿来等,也有在藏区生活的汉族作家马原、马健等。现在的这一批作者,比如达真、格绒追美、泽仁达娃、尹向东、注西彭措等,都是生于康巴长于康巴,并以康巴生活为底本进行创作,他们有着与前辈不同的地方。

在大家都在谈莫言。我觉得莫言早期写的《透明的红萝卜》有一个突出的特点,就是他对新鲜和陌生的喜好和追求,体现在《黑夜与白天》;里的金色红萝卜的描写。这种创作特点直接影响了他的后期小说。因此,原始地、细致地展现康巴藏地风土,是康巴小说共同的特点,也是这些小说区别于别的小说的重要元素。

H:事实上,对自然图景的描

绿光的眼睛。绒布手握长刀,双腿紧夹战栗的马腹,一路砍杀过去……”为了取回被盗的牦牛,绒布大声地向几位彪悍盗贼吼道:“要么把牦牛留下来,要么把你们几个留下来,要么让我留在这坡上。”血性的情怀在战斗的情境里得到了更加充分的体现。

L:人们世代面对仇杀,也一直在追问:“为什么上千年的宗教,阻挡不了康巴人仇杀的脚步?”正是出于这样的追问,康巴小说家们才在自己的作品里书写战争、反思战争、呼吁和平。

H:在《雪山的话语》里,泽仁

上千年的藏传佛教却已根植于那片雪山草地,而且融进了在那里世代生活的人的血脉。即使是非常有才华的喇嘛土尔吉与一个女性的性事让寺庙蒙羞,执教土尔吉的老僧人也不是一味去责怪违规青年土尔吉,而是自责:“这屁都不晓得的毛孩子。唉!都怪我啊。”

这真写到这里时,特别动情地写了下面这一段文字:“说到心痛之处的老达杰自责的声音开始哽咽了,数道眼角纹紧紧地汇集在一起,干

路,格桑不知去向,顿珠则走上永远寻找爱人的漫漫途中……短篇小说能够写得这样丰满,实在是难能可贵。这正是得益于康巴藏地的风土人情,也得益于康巴小说的这种“多声部”的叙事策略。

L:达真、格绒追美、泽仁达娃、尹向东、蒋秀英、桑丹、赵敏等作家写的一系列以康巴地区为背景的小说,已经成为一股重要的力量,引起大家的关注。但是就像开始所说的,是否因此可以把他们称为“康巴作家群”,把他们的作品合称“康巴小说”,需要时间来进一步检验。

这些小说,有些还显得稚嫩,譬如在战争的宏大叙事里,在神性与人性关系的思考中,还存在一定的问题。我所接触到的一些长篇小小说,都以宏大叙事作为预设展开叙述,但是在这样的宏大叙事中,对人情、人性的描写,显然还有更为艰难的路,也可以说还有更大的空间需要拓展和掘进。

另外,神秘文化和异域风土,